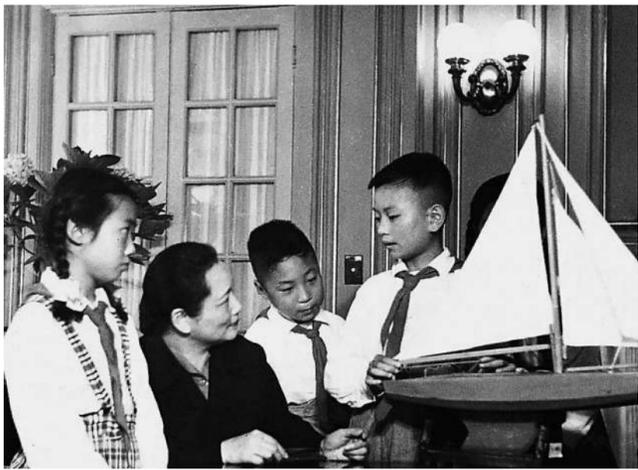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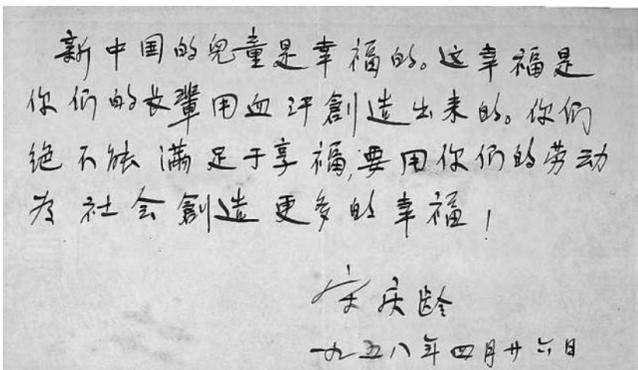


宋庆龄情系少年儿童

周惠斌



宋庆龄和少年儿童在一起



宋庆龄为《儿童时代》题词(16.8×31厘米)

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幸福!”1978年春,停刊12年之久的《儿童时代》复刊,宋庆龄欣然命笔,撰写了文章《祝贺〈儿童时代〉复刊》,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

1981年5月,宋庆龄在病榻上完成了她生命中的最后一篇文章《愿小树苗健康成长》,庆祝即将到来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可爱的孩子们,每当我想到你们,眼前就浮现出那些充满生机的小树苗。你们像小树苗一样,柔软的枝条,嫩绿的叶子,在肥沃的土地上扎根,在和煦的阳光下成长……”然而,当文章在6月1

日出版的《儿童时代》上发表时,宋庆龄已溘然长逝,令千万读者哀痛不已。

乐为“花朵”题词写贺信

宋庆龄一生为少年儿童的文化、教育、卫生和福利事业倾注了满腔热忱和深厚感情。1950年6月1日,宋庆龄在《解放日报》上为新中国第一个国际儿童节题词:“保护儿童的权利,是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必需条件。”

创办于1922年的《小朋友》杂志,是我国少儿读物中出版时间

最长、出版期数最多的刊物,1953年改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前夕,宋庆龄为该刊题写刊名“小朋友”三字,同时题词:“对孩子们进行社会主义品德教育,鼓励他们从小锻炼好身体,学习文化科学知识,长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979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宋庆龄在5月30日给天津市少年儿童亲笔书写贺信:“天津市全体少年儿童:你们好!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的时候,祝你们身体好,学习好!……你们在新时期新长征中,一定要勤奋学习文化科学知识,遵守纪律,热爱劳动,锻炼身体,成长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希望你们在今年的‘六一’节日里,过得更愉快,更幸福!”表达了她对祖国花朵的关爱和期望,并寄赠书籍,表示节日的问候和祝贺。数月后的国庆前夕,共青团天津市塘沽区委代表全区青少年,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请她为该区纪念少先队建队30周年活动题词。收到信件后,宋庆龄在10月8日欣然题词:“少先队建立30周年的日子里,祝孩子们身体好,学习好,很好地成长为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

1980年,宋庆龄为《中国儿童》创刊号题词:“愿孩子们勤奋学习,锻炼身体,光辉的未来属于你们。”同年6月,宋庆龄还为《天津一成都少年儿童美术书法作品展览》题写贺词:“我国书法是传统艺术之一,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声誉。少年儿童要练好字,继承这一艺术并创造新书体和新书风。通过《天津一成都少年儿童美术书法作品展览》,使书法艺术活动在你们之中广泛开展,后继有人。”题词寄托了她对全国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和文化教育无微不至的关怀。

1981年暮春,宋庆龄已然重病缠身,但依然关心着少年儿童的成长,她的文章《更好地为下一代着想》,发表在5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5月14日上午,也即她逝世前的15天,她在病床上,为即将到来的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报告会发去贺信:“我不能前去参加这次大会,但我关怀热爱儿童和少年的心和你们一起跳动……”慈母般的舐犊之情跃于纸端。

(作者系上海市崇明区博物馆副研究员)

鲁迅的端午情结

鲁迅的端午情结

钱国宏

鲁迅对端午这一民族节日怀有深厚的情结,无论是在聚会还是文学创作当中,都把端午放在了一个重要位置。在他看来,端午不仅仅是一个民族传统节日,更是中国人应有的一种血脉情怀。

鲁迅的故乡绍兴,有着浓厚的端午习俗和节日文化,他从小耳濡目染。1912年,鲁迅离开了故乡,客居他乡的每年端午节,他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家乡的端午习俗。1934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前日为端午,家悬蒲艾,盛于往年,敝寓亦悬一束……”人在他乡而犹在端午当天“家悬蒲艾”,怀乡之情,可见一斑。

传记作家许寿裳是鲁迅的同乡和挚友,从1914年至1919年间的6个端午节,许寿裳都要请鲁迅过来或是他到鲁迅那里一起过节。每次端午与朋友团聚,鲁迅都要提前筹备:开列邀请好友名单,选择聚会场地,挑选节日礼物,准备节日伙食……1914年端午前一日,鲁迅日记中记载:“晚未舜臣来,持赠香烟两匣,烧

鸡两只,角黍(注:粽子的别称)一包。以角黍之半转馈袁子元,半之又半与仆人。”

1925年端午,鲁迅请许广平、许美蕙和俞氏姐妹等几位女学生到家里吃饭。除许广平外,其余三人均是鲁迅三弟周建人在绍兴时的学生。这次聚会,鲁迅非常高兴,也禁不住多喝了几杯。而且从这个端午节开始,他与许广平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

鲁迅的端午情结还体现在文学作品里。1922年他专门创作了一篇短篇小说,标题就叫《端午节》。小说反映的是“五四”大潮退落以后,知识分子发生分化的情形。小说最初发表于1922年9月上海《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九号,后收入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

鲁迅的最后一个端午节是在病榻上度过的。1936年6月,鲁迅大病,起坐十分艰难,一时生命堪忧,坚持多年的日记也被迫中断。6月30日发高热时记下数句,已是端午之后七日了。病榻之上,鲁迅犹然不忘家乡的端午,神志清醒时,还不忘叮嘱身边的亲友在门楣之上插上艾蒿,“以闻其味”。

李敖与胡适的“忘年交”

王剑

李敖素以狂傲著称。他曾言:“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然而,如此狂傲的李敖,却对一个人崇敬有加,这个人就是胡适。

胡适与李敖渊源颇深。李敖的父亲李鼎彝是胡适的门生,李敖从幼时开始,就深受胡适思想的影响,对胡适骨子里的自由主义气息很是向往。后来,青年李敖发表了一篇对《胡适文存》的评论文章,连胡适都惊讶于李敖对自己的研究之深。因为这篇文章,胡适将李敖视作最了解自己的人,两人竟成了“忘年交”。

不久,李敖收到胡适的见面邀请,胡适将自己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从自由、民主、容忍三个方面作了全面表述,这些话让李敖受益匪浅。此后,胡适与李敖便开始了书信往来,大有唐代“元白唱和”之风。

胡适对李敖的照料,远不止于学术上的指导与提携。当初,李敖服兵役回来,为了生存四处打零工。胡适

听说后,立马为李敖寄去了一张1000元的支票,并邀请李敖与其一同到南港游玩。

胡适的率性与高古,让李敖铭记在心。他花费大量时间来研究胡适,撰写了《胡适评传》《播种者胡适》《胡适语粹》《胡适与我》等文章。李敖曾评价说:“在启蒙人物中,胡适是最稳健、最优秀、最高瞻远瞩、最具潜德幽光的哲人智者。”即便在胡适死后有人抨击他时,李敖也都会站出来仗义执言。

晚年的胡适,性格上更多表现出一种恬淡平和;而李敖并没有在与胡适的交往中变得成熟,反而越来越激进。胡适曾告诫李敖说:“你的才华,我们无法可说。但是你的文章太喜欢借题发挥了。你写那些挖苦女人的文章,最容易得罪女人和小人,要引起注意。”可惜,当时已经声名鹊起的李敖,早已不把胡适的批评和劝诫放在心上。他写了大量的抨击性文章,言辞尖锐,不留情面,在使自己获得大名的同时,也树立了很多敌人。

冰心喝什么茶

杨建民

著名作家冰心曾在她的文章中,引用过她一首诗:

琴棋书画诗酒花,
当时样样不离它。
而今万事都变更,
柴米油盐酱醋茶。

虽然引述了此诗,可她谦虚地说:“这首诗第一句的七件事,从来就与我无‘缘’。”甚至说自己“不会作诗”,名篇《繁星》《春水》等等,她认为“不过是分行写的‘零碎的思想’。”

说到茶,冰心虽然生于仕宦家庭,她说自己是中年以后才有了喝茶习惯。什么茶——茉莉香片。冰心小时候,看见父亲喝的盖碗茶中,有半杯茶叶。她去尝一口,发苦,不敢喝。偶然想喝,也是先倒上大半杯白

水,然后从父亲的茶碗中兑一点,颜色浅黄就行。她知道,这样喝只是止渴,不是所谓的品茗。

可她家有好茶具,是她的老师周作人送的一套日本精致的茶具:白底青花的一只竹柄茶壶,四只茶杯,“十分素雅可爱”。可长期只是摆设,茶壶装的是白开水。一天,丈夫吴文藻的清华同学闻一多、梁实秋来访,“我们受了一顿讥笑和教训,我们才准备了待客的茶和烟。”两位名家老同学真够不客气的。

到了晚年,冰心回忆,说抗战时在重庆,一面用“男士”为笔名,写《关于女人》的系列文章,一面喝着福建乡亲送来的茶——还是茉莉香片。此时想起祖父父亲,感受到茶特别“香冽”。可是她习惯浓烈,还是茶叶少些,并不称为“品”,而言其“解渴”。这个从中年形成的饮茶习惯,冰心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

张大千的为人之道

李云贵

张大千以画艺独步画界,在对待朋友和做人处世方面,也同样受到人们的赞颂。

27岁时张大千学会了打麻将,刚开始觉得打着好玩,后来就越打越上瘾了。有一次张大千被人设了圈套,打麻将输了很多钱,无奈他就用家里祖传的无价之宝——王羲之的《曹娥碑帖》抵了赌债。母亲临终之前想看一看这件传家宝,张大千手足无措,欲哭无泪。这件事被张大千的好友叶恭綽知道后,马上花重金购回,并归还给了张大千。张大千非常感动,他后来在为叶恭綽的书画集作序时,把自己年轻时的这件荒唐事公诸于众。朋友们劝张大千不必再自揭短处,而他则坚持写进序文,一是让世人知道叶恭綽的高尚品德,二是让世人知道不吃一堑不长一智的道理。张大千因为此事,发誓再不进赌场,也不让人玩麻将,还严厉告诫儿孙谁也不准进赌场。

张大千的二哥张善孖画老虎很有名气,早年张大千曾和二哥张善孖合作画

虎,但经常是二哥张善孖画虎,他补景。其实,张大千也能画虎,但他却很少画。一次,张大千酒后画的一幅《虎图》流落出去,不少商人登门出高价请他画虎。张大千后悔不迭,因为二哥张善孖以画虎享有盛誉,他原是为了二哥张善孖一直避讳画虎的。其实,张善孖也并不为此有什么不高兴,那幅《虎图》张善孖十分称赞,并且还题了字。但是,张大千仍然不能原谅自己,他本来是非常爱饮酒的,这次他毅然作出决定,从今以后再不饮酒,也不再画虎了。

徐悲鸿和赵望云都擅长画马,而徐悲鸿比赵望云的名声大,赵望云有些不服气。有一天,赵望云见徐悲鸿不在,就向张大千说:“大家都说徐悲鸿画的马比我画得好,你说说到底是谁画得好呢?”张大千肯定地回答说:“当然是徐悲鸿画得好啊。”赵望云听了张大千的话后,感到很失望。于是,赵望云又问道:“那是为什么呢?”张大千微笑着说道:“徐悲鸿画的马是赛跑的马和拉车的马,而你画的马是耕田的马呀!”

两岸一家亲 共圆中国梦

李霁君

方面工作:一是推动各级组织积极与台属及原国民党人士联系,动员他们同台湾的亲属建立联系;二是组织和发动党员及所联系的人士撰写了大量的对台宣传稿件;三是帮助台湾军政人员在大陆的亲属与在台湾的亲友通信。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对宣传和和平统一政策,动员台湾军政人员为和平解放台湾起到了积极作用。

两岸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强调实现祖国统一是民族的意志和历史的潮流,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真诚态度和基本立场,拉开了祖国和平统一的序幕,两岸关系开始发生重大转折,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为民革的工作指明了新的方向,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民革党员做好对台工作、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信心和决心。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民革中央举行对台工作座谈会,恢复对台工作委员会(后改为祖国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主要开展对台宣传和联谊工作。根据政策要求,民革以对台宣传联谊为重点,穿针引线,积极促进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和沟通,并在“三引进”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民革中央原主席屈武早年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结拜为兄弟,又有在苏联留学的同窗之谊,情同手足。他在多个场合以多种形式向蒋经国发出信息,希望蒋经国以民族利益为重,早日实现和平统一。屈武向蒋经国恳切陈词:“窃思兄弟隔墙,非国之福,偏安一隅,终非长策。为吾弟计,莫若顺应民心,握手言和,共竟祖国统一之伟业,同造中华振兴之宏图。”

蒋经国通过台湾和海外的朋友,向结拜兄长屈武转达了问候和感激之情,还表达了他十分强烈的愿望:深以不能亲临溪口为母亲扫墓为憾!为弥补手足兄弟的这一大遗憾,1987年6月,90高龄的屈武冒着酷暑专程到奉化溪口,替蒋经国拜

墓尽孝。

1987年10月,在大陆的积极努力和两岸民间的呼吁下,台湾方面宣布从当年11月2日起,允许台湾居民经第三地转赴大陆探亲,海峡两岸同胞分离38年之久的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海峡两岸人为的藩篱开始拆除,无数的家庭得以骨肉相聚,阖家团圆。

老一辈民革领导人积极开展对台工作

民革中央原主席朱学范曾担任新中国首任邮电部部长。针对两岸在信息沟通上几乎完全隔绝的情况,朱学范大力倡导与台湾“通邮、通航、通商”。1981年,朱学范在《愿海峡两岸早日实现鸿雁传书》一文中写道:实现“三通”,是统一祖国的第一步,通邮是“三通”的先声。

朱学范建议,在实现“三通”前,海峡两岸在职或退休的邮政同仁向各邮政当局取得同意,使两岸同胞每周互发“亲人邮袋”,由香港邮局转发,交换邮局定在北京、台北。民革中央多次举行对台通邮座谈会,邀请有关部门和团体就对台通邮通电的具体方案和有关问题进行研讨。最终,台湾当局同意由红十字会向香港转递邮件。尽管只是间接通邮,但是结束了大陆向台湾单方面通邮的历史,每年有百万封家书通过这样的方式,跨越海峡,来到了大陆。2008年,两岸直接通邮终于成为了现实。

民革中央领导人带头开展对台宣传,撰写文章,向新闻媒体发表谈话,表达对台湾亲朋故旧的思念之情。如民革中央原副主席刘斐于1980年元旦发表《三十六计,和为上计》,文章写道:“一条窄窄的台湾海峡,隔断了两岸的一切联系,对于我们中华儿女、骨肉同胞,这是多么大的不幸。争取台湾回归祖国怀抱,完成统一大业,是每个黄帝子孙都不容推诿的责任。”这些文章被海外报刊摘引或转载,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民革中央原副主席贾亦斌曾跟随蒋经国,1949年贾亦斌曾率蒋经国的“太子军”在嘉兴起义。蒋经国去世后,76岁高龄的贾老以个人名义访问香港,广泛接触有关人士共500余人次,并与台湾代表会谈,为两岸达成“九二共识”打下了基础。

王昆仑、李沛瑶等老一辈民革领导人,积极利用自身与台湾的特殊渊源关系开展对台工作。何鲁丽主席领导并参与尽速制订“反分裂国家法”的建议研究与讨论,推动反分裂国家法出台实施;周铁农主席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率团访问跨过了“浊水溪”……可以说,每一位老一辈民革领导人都充满了对台工作情怀和担当,都书写了一段感人至深的“台湾故事”。(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漫谈群”开设了“中华儿女大团结”专栏,邀请全国政协委员,围绕“讲好中华儿女大团结的故事”主题,开展互动交流。

5月17日,民革界别全国政协委员李霁君结合党派特色,在“委员读书漫谈群”中回顾了民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对台工作的历史,本文摘编自她的发言。

成立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

1948年元旦,民革在香港成立。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为新型政党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民革公开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表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拥护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从成立到响应“五一口号”、参加新政协,民革始终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坚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

1955年5月,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方式,即战争方式与和平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周总理关于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发言,引起了国内外人士和民革同志的强烈反响。民革全党一致拥护周总理的发言,一致认为应该采取各种方法鼓励在台湾的亲友回到祖国的怀抱。1957年2月18日,民革成立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由张治中任主任,积极开展对台工作。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成立后,主要做了三